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四五期 ——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4d)

【史海钩沉】	毛泽东从批江青到批邓小平的嬗变 (下)	郑仲兵
【往事非烟】	青春非常之旅——我的“文革”印迹 (下)	奚学瑶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 页：//museums.cnd.org/CR](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毛泽东从批江青到批邓小平的嬗变 (下)

• 郑仲兵 •

(续 z k 1 2 0 4 c)

1975年11月1日

晚，(邓小平)到毛泽东处谈话。毛泽东肯定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成绩(按：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413—414页记：“邓问毛，他主持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毛说，对。”似不好说就是肯定邓的正确。如是肯定，更可见毛之虚伪)，同时批评邓小平为刘冰等转信的做法。

1975年11月2日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毛远新在谈到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时说：“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又说：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按：指周恩来)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提议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当面向邓小平本人谈出以上意见。(按：毛远新的汇报，无非是毛的一着棋，

借以开始正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当晚,毛泽东)即指定陈锡联、汪东兴和毛远新(和邓小平)参加的四人会议。(按:中共正式开始批邓)毛远新对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工作,特别是实行整顿加以否定。邓小平反驳说:“我是从今年3月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9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按:邓此时还能据理反驳)

1975年11月3日

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2日晚四人会议情况汇报时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但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录自程中原等着《邓小平在197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566—567页)(毛决定)继续开会,范围扩大至八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等参加。(毛说,讨论限于“文化革命”问题,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处同上)。(按:可见,毛是十分清醒的,思维很明晰)

同日,吴德到清华大学参加校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所写信的批评。会后,根据校党委的部署,在校内师生员工当中展开一场关于教育革命问题的大辩论。(按:毛已点燃群众斗争之火)

1975年11月初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到邓小平家中谈话。谈话不欢而散。

1975年11月4日

邓小平出席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和毛远新参加的八人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会上,张春桥等指责邓小平:刘冰之所以把信寄给你,是由于你与刘冰彼此立场、感情有某些一致的地方。本日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八人会议讨论情况。毛泽东说:我批评某人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指示八人会议要逐步扩大几个人。(按:《邓小平在一九七五》一书还记述,当毛远新谈到会上有的同志讲,主席一个时间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毛特别强调他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可是后来“打倒四人帮”,抓了江青,都说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华国锋、邓小平、中共的官方史书都是这么说的,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1975年11月5日

邓小平就外交部《关于缅甸总统吴奈温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奈温已表示希望会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故我请外交部提出由我和春桥两人之一出面接待的方案。我觉得以后对主要国宾,由我一人出面,过于繁重,故这次拟请春桥出面(当然也可能客人有点见怪,以后春桥或先念多出面,就不致于误解了)。如何,请主席考虑指示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审核。”毛泽东阅后批示:“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迎送及宴会。”(按:邓似用扬言“撂挑”的方法,来试探毛)

1975年11月7日

晚,邓小平再次出席八人会议。

1975年11月10日

上午,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表示:我现在受批判,起因是转送刘冰的信。(按:起因岂是转送刘冰的信!)主席作了很严厉的批评,(按:这是邓自己说的,年谱和其它官方史书都没有提到“严厉”)我作了自我批评(按:什么内容,未见记述)。在胡乔木提出今后是否吸收“革

命造反派”参加政研室领导时摇头说：不要！（按：胡乔木就是这样的贱骨头，他真是可以称得上“投降派”了）

1975年11月13日

下午，陪同毛泽东会见吴奈温后，（邓小平）和张春桥被毛泽东留下谈话。毛泽东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中央政治局“帮邓”会议，并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按：毛让在“整顿”中支持邓的人参加“帮邓”，即批邓，这一着真是够阴损的！）毛泽东还就打招呼问题作出批示：“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

（按：所谓“桃花源中人”之说，应是毛的解嘲，因为邓是毛请出山的）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按指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按：毛对批邓是步步扩大，步步紧逼）

1975年11月14日

下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会议指出周荣鑫、胡耀邦、李昌三人的“错误”，并通知胡乔木等四人，提出中央政治局将在近日内开会谈他们的“问题”。（按：毛让邓自己主持批邓会——真够挖苦的）

1975年11月15日

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按指11月20日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晚23时，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按：还给邓以错觉）

1975年11月16日

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来信的批评内容。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胡耀邦、周荣鑫进行指责。

17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听了16日会议汇报后的指示。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对胡乔木、周荣鑫进行指责。

1975年11月20日

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婉拒，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按：毛给邓出难题。不知邓何以“婉拒”，如何“婉拒”？）

1975年11月21日

邓小平致信毛泽东：“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136人的名单（按：13日毛批示给“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只提出周荣鑫等“几十人”，邓何以扩大这么多人？），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次日，毛泽东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23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

（如清华），召集不起来。”同日下午5时，致信汪东兴：“请照主席今23日批示，通知于明24日下午4时开会。原件政治局各同志传阅。”（按：可见邓此时工作的重点也转移到开打招呼会和召集人批邓。邓小平对“批邓”如此精心安排，但毛还要层层加码！毛考虑得还如此精细）

1975年11月24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并宣读经毛泽东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提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按：“右倾翻案风”由此曾见于中央文件，邓大人真敢为自己上纲上线！）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邓小平就“三个正确对待”、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对待新生事物、正确对待“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待青年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说明。还说：这次清华大学的辩论，将很快会扩大到全国，这次会议，有中央党、政、军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和几位青年负责同志（按：还是找了青年人）共130多人出席。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要求他们进行讨论并将讨论情况上报中共中央。12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将这个文件传达范围逐步扩大到基层。（按：这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便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1975年12月20日

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检讨发言，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并介绍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状态。（按：这是邓的第一次系统的检讨，看出他对毛还存在幻想，还在说违心话）他检讨说：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会后，致信毛泽东：“在今（廿）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同志们还会继续给我以更多的批评和帮助，使自己得到更大的益处和提高。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按：毛至死也没有见他）

1976年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公布毛泽东批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1976年1月3日

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作补充检讨。在检讨中说：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请示主席，也没提到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会后，将补充检讨稿送毛泽东，并致信表示：“上次在政治局会上作过初步检查之后，又听到远新同志传达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先是六位同志，随后又是两次大的会议上，同志们又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评和帮助，使我进一步地认识到上次检查的不足。”“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取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外，总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对于错误的认识，取得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按：邓求见毛的急切心情如此，他愈急于求见，毛愈不见他）14日，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按：所谓“发政治局讨论”，就是要继续“深入”批他）

1976年1月8日

上午，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之后大家都忙于处理善后和治丧事宜）

1976年1月1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张春桥提出由叶剑英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时，遭到叶剑英反对。叶剑英提议由邓小平给周恩来致悼词，得到与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

1976年1月17日

邓小平同胡乔木见面，阅胡乔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商量后起草的给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的一封信。信中请求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业务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邓小平阅后表示同意信的内容，并说政研室的问题要听候中央处理。19日，这封信发出。（按：胡乔木就是这么个人，当时已吓得屁滚尿流，开始揭发邓小平）

1976年1月20日

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作检讨（按：应是第三次检讨）。会上，江青等轮番对邓小平进行指责和批判。针对有人提出“为什么提出要见主席”的责问，答道：我的意思是，想当面向主席讲自己错误的严重，特别想当面听取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还想当面提出自己的工作问题。我觉得这种要求是正常的，我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按：此时连请求见毛都被当成问题。邓已然只有招架之功而无反手之力了。）

是夜，致信毛泽东：“在上次会上同志们要求我在讨论之先，由我讲讲要对主席当面说些什么，所以我在今（20日）晚的会议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现送上，供审阅。”“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错误和面聆主席的教导外，确实想谈谈我的工作问题。还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提出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自己确很踌躇。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栈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主席面谈这个问题为好。”“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我自己再不提出，实在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按：邓最后一次见毛是1975年11月13日，距此已两个月零八天了。邓巴望着见毛，毛就是不见他，而且还让人提出：“为什么要提出见毛主席？”这就是专制体制下君臣关系。此时邓只好提出解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职责为要挟，可能也是最后的试探吧。）

1976年1月21日

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20日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后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按：何谓“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按：何谓“引导得好”？）。在毛远新请示说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个人做具体工作时，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按：毛看重的华“自认为政治水平不高的人”，有意思！要华带头，就等于宣布邓下台了）在江青、张春桥授意下，迟群召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党委负责人会议，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按：两校是毛亲自抓的，为什么非说是江、张授意的？公然点名批判，意味着毛已把邓当作非“内部问题”加以整肃了。难道这就是毛说的“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吗？真是虚伪狡诈之至！）

1976年1月—4月

在江青、张春桥指使下（按：又说是江青、张春桥），迟群主持编造了《邓小平言论摘录》、《邓小平言论与马列毛主席教导对照》、《邓小平言论与孔孟之道对照》、《邓小平与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言论对照》等材料。（按：这是毛整人，置人于死地的一贯手法，也算是一大发明创造！）

1976年2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按：指〔1976年〕1号文件），宣布：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

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自中共中央通知发出后，邓小平实际上被停止中央的领导工作，（按：恐怕是被停止了一切工作，只有聆听大批判的份了。）叶剑英实际上被停止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1976年2月25日—3月初

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打招呼会议），传达经毛泽东批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提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按：已经上纲到“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1976年3月2日

江青擅自召集（按：何谓擅自召集？）出席中央打招呼会议的12个省、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当众诬蔑邓小平是“反革命两面派”、“法西斯”，“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江青要求把她讲话的部分内容印发全国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1976年3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批邓”问题在党内公开。（按：实际上早已公开）

1976年3月26日

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青等的策划下，迟群等带领清华大学五名师生代表列席会议，以“汇报清华大学运动”为名，当面攻击邓小平“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复辟资本主义”。（按：何以见得不是毛策划的？什么“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明明是出席批斗会！）

1976年3月下旬

南京等地爆发声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1976年4月4日

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200多万人次参加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达到高潮。邓小平要求全家人在这期间都不去天安门广场。

1976年4月5日

上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张春桥当面诬蔑邓小平是“纳吉”。

1976年4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按：未通知邓小平、叶剑英等出席），一致通过：一、《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还提出“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本日下午，邓小平夫妇被迁至东交民巷一处住所住下，并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

1976年4月8日

夜，邓小平通过汪东兴转呈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在信中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按：竟能说得出出口，真是可怜之至！）

结 语

从1975年4月毛授权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到1976年4月毛再度拿下邓小平，历时正好一年，而邓小平主动和江青叫板，并开展整顿不过半年。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为江、张等“批经验主义”向毛泽东告状；毛4月23日的批示和5月3日讲话对江青批评后，邓即主持政治局会议多次批江。与此同时，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开展全面整顿，顺带揭江，包括拆江的台，不断向毛转递各方面告江的信，甚至有意布置收集有关江的材料，鼓动马天水“反水”。整顿从经济领域出发，直逼江青的领地——文化艺术界，直逼毛掌控的教育领域及其试验地——两校。于是到8月14日便有了毛评《水浒》的出台，所谓“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搞修正主义”，显然是冲着邓说的。毛评《水浒》成了一道分水岭。从此，毛不再待见邓小平而开始收拾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们更藉势对邓展开反击，邓顶了一段时间，但已处处被动。

人们难免要问：邓复出前曾向毛发誓“永不翻案”，又明明知道毛江的政治关系，何以1975年春就胆敢向江青主动出击？是他真的相信毛对江青的批评？真的相信毛对自己的倚重？还是他看到林彪命丧黄泉，毛有难言之隐，周恩来病入膏肓，无回天之力，江青、张春桥积怨甚多，难以成器，毛自己老病缠身，不知所终，寻思收拾残局，舍我其谁？此题自有待深入考据，但可以肯定地说，邓小平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完全低估了毛垂死挣扎的力量。

10月13日，邓小平又转递了刘冰等人再次告迟群、谢静宜致毛泽东的信。毛说：“矛头是对着我的。”算是图穷匕现，于是以“帮邓”名义开始正式批邓。从最初的四个人，扩大到八个人，再扩大到17个人，几十个人，直到130多人，历时两个月。层层加码、步步为营。邓小平几乎没有什么抗争，虽经一再上纲上线的检讨，也无法挽救他一败涂地的厄运。

邓小平主动向江青开战，特别是开展全面整顿，无疑对“文革”的倒行逆施有一定拨乱反正的意义，从而赢得了社会民众的广泛赞许，加上邓小平在“文革”中首尾两度悲剧的下场，更赢得民众的普遍同情。但需要指出的是：

一，邓小平在与江青斗争中，在全面整顿中，主要还是打着毛的旗号，借重于毛赋予他的权力，利用他的行政资源，包括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以求恢复“十七年”一党专政的传统。

二，他对“文革”中民众的自我觉醒，自发地抵制“文革”、反对毛江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并无积极兴趣，更无在全面整顿中试图改革政治体制，实现人民民主的意识。

三，当“四五”运动爆发，亿万人民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毛江“秦皇暴政”，同时也为邓小平抱不平，邓不仅没有和人民站在一起，而且还坚决与之划清界限，生怕与自己沾边。甚至还专门给毛写信，表示拥护中央就天安门事件所做的两个“决议”，并为“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感谢”。

四，对比邓小平的批江、整顿和人民群众的“四五”运动，可以看出，二者在否定“文革”和政治诉求上的迥异，即便在追求现代化问题上，也非同道。正因如此，不难理解邓小平虽遭毛的两次整肃，但他的后半生还是继承了毛的政治衣钵，成为镇压人民、压制民主的第二代专制独裁者，绝非偶然。

1975～1976年，是“文革”的最后一年。回望当年，我们看到那是风云会际，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年。

这一年，是毛泽东为“文革”垂死挣扎的一年，也是他生命走到尽头的一年。

这一年，是周恩来秉承毛的意旨，向邓小平全面交权的一年，也是周在肉体和精神极度痛苦中走到生命终点的一年。

这一年，是邓小平和江青你死我活争斗的一年，也是江倚仗毛最终击败邓并登上政治顶峰的一年。历史充分证明了毛存江在，毛死江亡的毛、江政治夫妻一体化的关系。

这一年，是中国民众普遍觉醒的一年，是人民群众运用毛为发动“文革”赋予的“四大自由”直指毛及其“四人帮”专制独裁体制的一年。

□ 原载《新史记》2012年总第6期

~~~~~

### 【往事非烟】

#### 青春非常之旅——我的“文革”印迹（下）

· 奚学瑶 ·

（续 z k l 2 0 4 a）

北大的武斗，惊动了全国，母亲与舅舅们在上海也有耳闻，他们日夜在为我的安全担心。母亲多次来信，催我回家。信中说，万一我要出现意外，她是要“bào死”的！“bào死”是浙江家乡话，在字典里找不出同义词，意即痛苦之极，极度伤心，气急身亡，像爆炸一般死去。此语甚重，对我不能没有压力。父亲早逝，母亲独立拉扯我们长大，倘我有闪失，她将怎样处世？五舅舅也来信嘱我返沪，并电汇了30多元路费。但是，我怎么能走呢？留校的人本来已经不多，走一个便少一分力量，况且，我大小是个头头，我走了道义上讲不过去，一定会影响“军心”！我坚信，“井冈山”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最后必然会取得胜利。我们是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哪怕是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确实，我此时全心全意地为了“井冈山”，毫无私心杂念。也多亏了这份心思，否则我这条小命恐怕也就保不住了！

事情是这样的。五年级的邵敬敏，是“井冈山”的骨干，上海人，也是我的好友。他毕业分配到文化部，办完有关手续后，就到32楼来取行李和书籍。他劝我随他到文化部休息几天，学校里高音喇叭轰炸，饮食艰苦。我的心动了一下，但随即否定了这份私心，此时我决不能走，否则便要影响“军心”。于是，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帮着他把行李扛到37楼门口，送到了事先叫来的出租车上，然后返回了32楼。不久，便听说，他乘坐的车子在“公社”所占的34楼前被长矛队拦截，他遭到了绑架，被关到了一间屋子里，蒙上了头，遭受了残酷的殴打，被打得头破血流。后来，他的同班同学张普，找到了持“公社”观点的中文系的党总支副书记华秀珠，做了新北大公社07团工作，才将邵敬敏释放。邵之所以被抓，不外两个原因：一是猜疑他给“井冈山”运送什么材料；二是“公社”瞭望者瞧见了我，以为我要出行。无论什么原因，都与“公社”07团密切相关。幸亏，我没有出行，我若出行，便不止是流血的问题，这条命八、九成是保不住了——“井冈山”05纵（地质地理系）的刘玮，就是在抓去后，被众人活活打死的。此时，两派都已视若寇仇，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是07团最大的眼中钉，一旦抓住，岂有不拔之理？！

“井冈山”被包围在里边，吃饭成了大问题，幸亏在地院的同学，设法购买了很多粮食，从农村找来马车。马车载着粮食，“咣当”、“咣当”地从37楼门前经过，事先做好准备的



“井冈山”立即从出口处冲出两彪人马，一是扛粮食的，二是拿着长矛守卫的。不一会儿，两辆大马车上的粮食即被卸完了。“公社”错以为“井冈山”抢了农民的粮食，大喇叭里便发出了严正警告：“‘井冈山’的暴徒们，你们竟敢哄抢公社社员们的粮食！……”“井冈山”的广播台则得意地播放歌曲：“‘井冈山’的红旗美如画……”

（略）

武斗形势愈来愈凶险，双方都在积极备战。“公社”方用拖拉机改造成了土坦克，搜罗枪支弹药，制造了燃烧瓶。“井冈山”亦制造了燃烧瓶，并到外地搜求热武器。期间，清华大学两派武斗后来居上，开枪打死了数人，客观上绷紧了北大两派的武斗神经。为了以武力战胜对方，各方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体力和智力。由青年工人组成的“井冈山”“小海燕”战斗队，其中一些人本来就练过武术，他们会使用长矛、大刀和九节棍等，此时在“山上”甚是活跃。哲学系五年级学生孔易人，原是学校武术队的成员，此时也变成了“井冈山”的武斗指挥员之一。“井冈山”广播台中，人才辈出。负责机务工作的化学系五年级姜承永同学，从学校电话班同情“井冈山”的一个工人中获悉，在28楼与29楼之间有电话干线通过。生物系生物物理专业胡志远，从外国间谍小说情节，穿越柏林墙电话窃听中获得灵感，经总部成员胡纯和的批准，化学系耿天彭、李鹏两位同学，挖通了连接电话干线的地道。胡志远接通了电话干线，并加上了一个电阻，在己方则用电子管信号放大，使对方一直没有发现窃听现象。之后，他们用电话线连接到对方的线路上，然后由国际政治系的温标和地质地理系陈荃俩人轮流监听，随时掌握“公社”的动向，尤其是对方的兵员调动情报。此事在当时“井冈山”内也是绝密机要，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解密之后，也让我大为惊讶。工宣队进校后，“井冈山”交出了全部12本监听记录，此是后话。

为了准备打大仗、恶仗，便于秘密地调兵运物，我们在占据的各楼之间开挖了地道。地道宽不到1米，高约1米5，一个人弯腰可以穿行。我们准备了各种挖土和运土的工具，将自行车轮当吊车滑轮，用脸盆一盆一盆往外运。先挖了几米深的竖井，然后再往前掘进，不到一周功夫，我们挖通了32楼到35楼的地道。从32楼通过地道，可以穿越35楼、36楼至37楼，直到“井冈山”唯一的对外出口。32楼至28楼之间未挖地道，但一旦需要，则可以从35楼到30楼，再到28楼绕行。

担心底下运兵太慢，万一被人堵住，便不好办。于是，我们在28楼与30楼、32楼与35楼之间的四楼上空，架设了两座天桥。28楼与30楼之间的天桥，跨距约20多米，凌空高挂，气势宏伟。它全部是木结构，木料来自屋顶的人字梁，数力系同学经过周密的力学计算，可以承重若干分量，确保往来无虞。桥架成后，不知哪个同学，在桥的北侧挂上了一幅毛主席像，让毛主席当我们的保护神，以防公社从二十九楼向天桥发射石头。32楼通35楼之间的天桥则要简约得多。它是个软桥，上下拉着几条粗电缆，铺上一排模板，走起来晃晃悠悠的。

“校文革”和“公社”在加强武备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井冈山”的“文攻”，不断地搞所谓的挖山运动。他们依仗“校文革”掌权和御定大左派聂元梓的政治优势，抡起“反聂即反动”的政治大棒，来恐吓“井冈山”成员及其家属，迫使一些意志上不甚坚强的同学、老师答应下山。“公社”广播台每天反复广播所谓“造反下山”者的声明，以瓦解和动摇“井冈山”的军心。后来，在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所谓“五大领袖”时，聂元梓还向毛当面炫示她的挖山功绩，只是毛也不糊涂，回答是：“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两派剑拔弩张，武斗形势愈来愈凶险，守楼的人数也日益减少，最少时，“井冈山”一方大约只剩下200多人，中文系“井冈山”的只剩了30多人。这30多人，无疑是最铁杆分子

了！白天，各自分头活动，每到晚上七点，则是集体开会时间。到时，大家聚集到416大宿舍，先是互通信息，把校内校外以至全国的耳闻目睹的各种信息，贡献给大家，然后偏执地向有利于自己一方分析解读，并借以给自己鼓劲打气。每次例会之后，必然履行一个仪式程序，人们端起长矛，往水泥地上使劲一顿，高声念诵毛主席语录：“井冈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时至七月中旬，“校文革”、“公社”一方，开始对“井冈山”一方断电断水。断了电，“井冈山”六座楼漆黑一片，“井冈山”的食堂就做不了饭，“井冈山”广播台便静无声息。虽然，后来广播台用自备发电机供电，但食堂做饭还是成了问题。“井冈山”总部经过反复的商讨、争辩，终于形成了一个决议，决定另辟渠道，与37楼前马路边上的高压线连接。接高压线只能带电作业，没有保护设施，两万伏高压，本身十分危险；这是其一；其二，“校文革”、“公社”一方必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必然要用武力阻挠接电，势必形成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并且武斗很可能升级，动用枪支坦克。对此，“井冈山”武斗指挥部做了精心的部署，广播台的关玉霖等3人，亦反复练习接电的有关技术与程序……

“井冈山”备战正酣，突然传来了一个噩耗：地质地理系61级“井冈山”人刘玮回校办理毕业手续，在海淀街上被“公社”武斗队抓到40楼内，使用自行车链条等家伙，对他轮番残酷殴打，死于非命！他是一个忠诚而纯真的人。面临毕业，依然要求“站好最后一班岗”，坚持守楼，并在楼里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刘玮之死，更加激起了“井冈山”守楼者的仇恨，悲愤之气深深地笼罩着“井冈山”。为了纪念文章，地质地理系“井冈山”同学，给我送来了他的一些遗物，天意弄巧，居然至今还让我保留着一本旧笔记本，本里抄录了他的一些文字：

其一：《毕业登记表》工作志愿栏下：

“革命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其二：写给女友的情书：

唐XX同志：

你好！收到你的来信，知道你们近来比较忙，“忙”才是正常的现象，“忙”表示有事情干，表示“要关心国家大事”，现在我们等待毕业分配，没事干，不忙，却显得很不是滋味。

《真正的朋友》这首歌的确很好！我和你有这同样的感觉，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它是毛主席光辉著作的一部分，是中阿两党两国战斗友谊的高度赞扬。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时，从那特有的阿尔巴尼亚旋律中，听到毛主席的光辉语录时，我就想起战斗的中阿友谊是在共同反对苏修中凝结形成的。在共同的保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反对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战斗中形成的中阿两国两党生死与共，风雨同舟，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奋斗目标，把远隔千山万水的两个国家、两个马列主义的政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只有这样的友谊，才是牢不可破的。

关于我们，我想我们都是生长在红旗下的，党和人民供养我们念了那么多年书，是期望我们能够很好地为人民服务。现在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了，真正地为人民办事了，将来不管到哪里，到什么岗位；都一定要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大众的牛。平时我们常讲，生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身。我最最不喜欢，那些把这些话放在口头不准备付诸实现的人。我想你也一定是这样，将来不管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岗位，我们都要履行一个毛主席红卫兵对毛主席无限忠诚。

唐XX同志，有一段最高指示给我以最大的鼓舞，每读到它就使人热血沸腾，这就是毛主席“七三”批示中的一段话。毛主席他老人家把埋葬帝国主义的光荣的战斗任务托付给我们这一代了，我们“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怎么能不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呢？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事业才是使我们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基础。正像你心中所说的，只要

“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远隔千山万水又算得了什么呢？

.....

刘玮 6. 1 5

刘玮之死，强烈地激发了“井冈山”人的“士气”，虽然几百武斗者，没有浑身缟素，但以哀兵之态，憋足了劲，准备投入一场殊死的拼杀！

7月22日晚上，在“井冈山”武斗指挥部谢纪康（总部成员，物理系四年级）、梁清文（地球物理系一年级）和孔易人（哲学系五年级）等人的调度指挥下。守楼的人员，手持长矛，从各楼由地道摸黑向37楼集结，部分人员身上装着燃烧瓶。在37楼朝南的各个窗口，都装上了强力弹弓。时近十二点，从37楼冲出两队人马，分别到马路东西两端站定。他们把木床架到了马路上，在床前方洒上了致滑的黄豆和绿豆，在床上架上了弹弓，人则持长矛守候在木床旁，严阵以待对方的冲击。接电者面临险恶，心知肚明：联接高压线毫无实践经验，有生命的危险；对方如武斗升级开枪，第一枪的目标便是他们，真可谓九死一生！然而，为了“井冈山”的生死存亡，他们已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关玉霖等三人分成了三个梯队，准备一个倒下，后边的接着上。他们已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事先给家人留下了遗书……“校文革”、“公社”一方，看到了这个情景，他们也很快做出了反应。训练有素的长矛队分别从34楼和40楼东西两方向中间夹击，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便在马路上展开了！

我的腿脚不便，同学们照顾我，让我领着六、七个体弱多病的人留守32楼，以防“公社”从背后袭击。留守人员一边把守楼道窗口，一边焦急地关注着37楼。当两方短兵相接时，双方的喇叭一时竟然没了声音。呐喊声，长矛格斗声清晰可闻。在那个呐喊声中，我们甚至辨别出了王振美高亢响亮的声音。之后，双方都开始投掷燃烧瓶，其燃烧轨迹成为一道漂亮的弧形，在夜幕中往来穿梭，煞是好看，战地黄花，掩盖了血与火的凶险。“公社”没有开枪，也没有动用土坦克，更没有背后偷袭，也没能突破“井冈山”的木床绿豆防线。在此同时，“井冈山”在28楼上却奇袭了“公社”后方。几个人先是用铁棍扔到对方裸露的电线上，企图造成短路，未果。后来改用铜丝漫洒下去，连搭在几根电线上，于是，火光一闪，全校电线都短路了！顿时，燕园里一片漆黑，“公社”广播台哑然失声。时隔不久，接电成功了，“井冈山”上灯火通明，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井冈山”广播台立即播放了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并且激奋昂扬地播送了早已准备好的庆祝文稿。

两派的一场大战告終了。双方似乎都已精疲力竭，校园里一片宁静，出奇地宁静，在静静的背后，则孕育着一片杀机。“井冈山”深知，虽然取得了接电这一回合的胜利，但“公社”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会将武斗升级，对“井冈山”实行强烈的报复。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更为严酷，双方都加强了备战，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恶仗、大仗。

然而，柳暗花明，局势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七日向清华大学派遣了工人宣传队，遭到蒯大富的武力抵制。他便于翌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北京高校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毛高高在上，清楚分明地观察着北京高校天、地两大派的矛盾，观察着北大、清华虫蚁般的恶争和撕咬。学生们的内斗，已无助于他的战略部署，他也不再需要这代青年学生追求民主自由、造反革命。他需要的是恢复他大一统天下的政治秩序，此时，工人和军队便是他最可靠的工具。尽管他此时在感情上还倾向于他政治棋盘上的马前卒聂、蒯二人，明确表示是倾向他们，但为了维护政治全局的需要，必须派遣工宣队以稳定局面。这一决策客观上则利于受包围和遭压制的北大“井冈山”和清华“四、一四”，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从而引发了聂、蒯对工宣队进校的强烈不满。老蒯事先不知，便以武力作抗争。聂则与孙蓬一等人商定，准备坚守楼

舍，抗拒工宣队进驻，如若失败，则率残部遁逃北大荒。毛的召见，使聂元梓得知中央的决心，她虽然心怀强烈不满，却知道无可奈何花落去，大势已定！

当天，“校文革”不得不发布了一个《立即解除武斗工事，上交武斗工具，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但是，《通告》仍强调要落实谢富治3月29日宣布的“四项决定”，即还要继续抓捕所谓刺杀聂元梓和李钟奇的凶手。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表了支持《通告》的《声明》，要求“井冈山”一方交出“现行反革命集团头子和一切漏网分子”，气势汹汹地扬言：“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

尽管两派的对立情绪尚未消除，但剑拔弩张的武斗形势已涣然消解。我们知道，武斗再也打不起来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被压抑了整整4个月的身心，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借了一辆自行车，来到了未名湖边，重睹久别了的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心头充满了欢悦。路上，见到了一个公社派的铁杆、中文系的某位老师，我这回不再惧怕被公社绑架，大喊了一声“老X（姓）”，他大吃一惊，我赶紧蹬车驰回32楼。

我们的活动没有停歇。“平型关”借机恢复了运作，很快聚集起一批骨干，讨论我们在新形势下的方针政策。对于工人宣传队，我们取得了共识，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制止武斗的，有利于北大“井冈山”，我们应表示欢迎。至于工宣队进校之后，会有什么其他后果，我们则无从预测。

在外边躲避武斗的同学、老师都纷纷回校了，劫后相逢，分外亲热。中文系数十个老师、同学在37楼南墙新开的大门口，摄影留念。至今，我尚存有这张照片，清一色的“井冈山”铁杆！

八月十九日，工宣队军宣队正式进驻北大。中文系的工宣队来自北京齿轮厂，都是一些出身好表现积极的工人或干部。军宣队则来自63军，即4587部队。他们来自石家庄，曾在当地支左，也曾帮助北大“校文革”搞过军训。他们到来，首先缴了两派的武斗器械。“公社”交出了长矛、扎枪930支，安全帽518顶，护身甲336件，铁棍约200根。“井冈山”交出了长矛749支，铁棍71根，护身甲208件，柳条帽432顶，弹弓8个，小口径子弹37枚。（上述数字见《北京大学纪事》6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与此同时，工军宣传队还要求双方拆除武斗工事。于是，“井冈山”的天桥被拆除了，一楼堵塞窗口的障碍被拆去了。原先积存在屋里的从地道挖出的泥土，也从窗口铲到了楼外，堆起了一座土包。……

（略）

8月25日，姚文元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声言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宣告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知识分子要无条件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于是，知识分子，不管是旧社会出身的老知识分子还是“文革”中一度成为闯将的红卫兵大学生，都成了继地、富、反、坏、右、叛、特、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后的臭老九，必须耳提面命地接受工人和解放军的再教育。一些青年工人，入伍不久的小战士，一些“大老粗”们，都成了我们神圣的导师。有的老师，心里不服，稍稍流露不满情绪，便被宣传队员指责为“反对工宣队领导”，大帽压人，谁敢不服？于是，同学、老师们纷纷在大小组会上“斗私批修”，自批知识分子的原罪，表示绝对服膺工人阶级的领导。红卫兵爷爷的时代已经过去，“臭老九”时代终于来临！

十．“老九”劫难

我在高中时有一外号，叫“鸡头”，到了大学不知为什么，被晋升为“狗头”。文革之后，“狗头”叫出了名，不只本系尽人皆知，外系亦颇闻其大号，亲昵者称为“狗头”，另一派则恶狠狠地称为“奚狗头”，大标语扬言要“砸烂奚狗头的狗头”。“井冈山”的代表人物是孔杨（羊）牛（牛）侯（猴）们，多与动物有关，而在中文系则多了一个类别，被称作“孔杨（羊）牛（牛）侯（猴）狗之流”。

也是命大，两派恶战，我始终坚守在楼里，“狗头”未曾被砸烂。工宣队与军宣队进校之后的第一个战役，便是围剿“派性”，我自然成了中文系的“井冈山”派的头号目标。为了搞平衡，“公社”派则被拉出了中坚分子刘丽川同学，让我们在全系大会上做检查。第一个出场的是我，照着准备好的稿子念，都是言不由衷的官样文章，且大段大段引用毛主席语录。其中一段，是说知识分子“要夹起尾巴做人”。当念到这段话时，下边便发出了“哧哧”的笑声。主持会议的军宣队钟姓排长，不知原委，在我检查之后，就对“要夹起尾巴做人”的话题，大加批判。谓我检查不诚恳，不老实。“你现在夹起尾巴做人，是装死躺下，你是想等待合适时机，再把尾巴翘起来吗？”原来小声的窃笑，这下子则成了哗然大笑。且笑声一浪高过一浪，笑得钟排长直发懵。他哪里知道其中的就里？人们既笑我的“夹尾巴”的典故，也笑他的不学无术——一连这么常用的毛主席语录都不知道！双重笑料，使得一场严肃的批判会充满了喜剧意味，一场批判会被搅黄了。这时候，钟排长恼羞成怒，扬言要把我拉到全校会上批判，但不知为什么终于不了了之。当时，要是有人把他的话说上纲上线，说他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若干年后，在一次人民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的饭桌上，我正犹豫地打量着身边的女士，只听她脱口大叫：“狗头！”不是别人，正是当年一起挨批判的刘丽川同学。久别相逢，甚是亲切。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当年挨批判的往事。后来，她嫁给了同班“井冈山”的张卫东同学，以实际行动，消除了“派性”。之后，我们亦有联系，我深知这是一个很有正义感且热心仗义的好同学，只是我们当时各为其派罢了。

不知在什么时候起，女同学中流行起在塑料窗纱上绣毛主席像的活动。女性即使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仍不失其热衷女红的天性，也许，这样的活动，能使她们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吧？我班的同学刘莉莉，是高教部代部长刘仰峇之女，聪明活泼，性格外向。在两派之争中，虽然因父亲之故，不能参加一派，而思想情感上，则倾向我们，与我们有较多共同语言。一次，她在窗纱上，绣了一个狗头，拿到班上，在同学们面前，作为一件小礼物送给了我，并借此取乐，大家当时见了也就一笑了之。谁知，工宣队知道了这事后，对此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极严肃地召开了全班的揭发批判会，会议连续开了三天，先是上纲上线批判其绣狗头的罪行，其中心逻辑是自窗纱绣了毛主席像之后，绣其它东西便是对毛主席的不敬和亵渎，绣了狗头则是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便是反动罪恶，十恶不赦。由此而起，工宣队又引导大家揭发批判刘莉莉的日常表现，把她描绘成一个丑恶的资产阶级臭小姐。把刘莉莉批得灰头土脸，心绪甚为恶劣。此事因我而起，三天批判之中，我如坐针毡，根本无法为她申辩，并且还不得不随声附和，随着他大家一起批判。此种批判，让刘莉莉如坐炼狱。她很坚强，挺了下来。倘换了一个较弱者，其后果不堪想象。

刘莉莉，后改名刘青锋、刘青峰，其夫君为金观涛。她多年主编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文化刊物，编著其他书籍，成果颇丰。她当年身体纤弱多病，而今却甚为坚韧，不知是否与文革的“锤炼”有关？

批判“派性”之后，则进一步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化学系三年级（简称0363——03系，63级），就揪出了以陈醒迈、齐菊生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二十多人被隔离审查。其中李人杰同学（因头上有一撮白头发，故外号“小白毛”），迫于压力，精神崩溃，逃离学校，自缢于清河农舍之前。各系亦纷纷揭、批、查教员与学生之中的历史与现

实的政治问题，并且，还传来了非官方版的最高指示：“北大是池深王八多”。不久，“王八”便纷纷被捞上岸，各系都设立监管小组，对这些大小“王八”们集中看管。到了吃饭时间，每每可以看到几个学生，驱赶着一帮“王八”到食堂打饭，这成了当时北大一道奇特的风景。

中文系的王福堂老师，他因议论刘少奇下台是所谓“宦海浮沉”，而被上纲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他拉到长安街进行批斗。致使中文系一些与之有往来的一些青年教员诚惶诚恐，压力颇大。第一次，在第二食堂召开全系批斗王福堂的会上，工宣队安排青年教员周强领喊口号，周强一时紧张，当时喊道：“工人阶级对毛主席……对毛主席最、最恨！”神经过于紧张，“最亲”竟然喊成了“最恨”，于是，便成了“自己跳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当场被押上了批判台。

六九年春节，自然寒冷与政治寒冷交集，中文系师生度过了所谓的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大年初二，全系师生集中在二教西侧阶梯教室，批斗以吕乃岩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他们之中除吕乃岩之外还有唐沅、严家炎、谢冕、曹先擢。吕乃岩在1959年曾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家乡饿死人的情况；唐沅对江青在北大讲话颇有微词；严家炎则是自行坦白，对林彪有关历代军事政变讲话所引起的担心。诸如此类，这些问题便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行，他们都成了反革命。被监管，被发配到锅炉房劳动。而这一一些人，或者是烈士子弟，或者系从部队转业，都是一些所谓根正苗红的中青年骨干教员，他们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我的“井冈山”朋友，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姚成玉，也在这次“清队”中中箭落马。他听说俄文楼出现“油炸江青”的反动标语，一边与同学议论，一边在纸上书写着“油炸江青”这几个字，写完以后，就随意扔到一边，却被一个原“井冈山”同学告发，于是，姚成玉便成了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平日哼唱的芭蕾舞《白毛女》配歌：“太阳在哪里，太阳在哪里……”则成了他诅咒现实黑暗的“疯狂发泄”。于是，他从班、系的批斗会，上升到全校的批斗会，在东操场万人大会上“坐了飞机”（“飞机式”被押解批斗）。我坐在下边，难以言说，还不得不跟着举手喊口号。后来，他被发配到锅炉房里烧锅炉，我到“五四”操场锻炼，远远地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然而，我们不能说一句话！

“清队”运动日益深入、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一些人不堪精神压力，纷纷“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有人卧轨，有人投湖，有人割脉，更多则是跳楼以示决绝。最盛的一天，北楼刚有人跳下，南楼又有人纵身。四十楼跳下一人，是我们的俄语老师，叫朱耆泉，上海人，三十多岁年纪，和蔼可亲，脸上常带微笑。由于同出上海，课间我们常在一起闲谈。听说他是摘帽右派，虽已摘帽，但依然难逃政治厄运。不知因为什么，他也走上了不归路！

“清队”亦在井冈山兵团内部进行。工军宣队以办学习班方式，将“兵团”总部成员集中隔离，并发动群众，群起揭发总部头头的大小问题。我不是总部成员，未遭隔离，但工军宣队则施压力，谓我是知情人，要我起来揭发，进行反戈一击。我与总部成员甚为熟悉，我们是患难之交。我虽然与其中几个人有过意见分歧，但我们的反聂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不能迫于压力，无中生有地编造所谓材料，出卖自己的朋友，出卖“井冈山”。所以，尽管他人如何揭发，工宣队如何施压，我则一字未写，一言未发。

学校又一次在东操场召开大会，要揭开所谓北京大学的阶级斗争盖子。会议主持人在主席台上突然厉声宣布：“把反革命分子侯汉清押上台来！”此话有如霹雷闪电，使我大吃一惊。紧接着，侯汉清背后蹿上两个人，不由分说，扭起侯的胳膊，摁住他的脑袋，把他押解到主席台上。押解侯的两人，都是总部成员，与我交往甚多。侯成了反革命，使我惊讶，而把侯押上台的竟然是自己的亲密战友，也是我视之为朋友的“井冈山”上的骨干，则更使我惊讶！显然，他们已降服于工军宣队，并不惜牺牲自己的战友，以求得自身的安全。这是早已安排的一场戏，

旨在杀猴给鸡们看。

当天晚上，我与几个同班同学去海淀街上闲逛解闷，迎面碰到“井冈山”总部的某个勤务员——那个押解侯汉清上台的其中一员。他喝了酒，喝得红头胀脸。见到我，紧紧攥住我的手说：“奚学瑶，侯汉清确实是个反革命，我们以前都没看出来。他把我们都蒙蔽了！”我无言以对，内心极为反感。

当天与当晚发生的事情，使我震惊，使我刻骨铭心。侯汉清，我了解他。他为人厚道，坚定有担当，沉稳大气，善于团结群众，群众对他有一种信赖感，从而使他成为北大反聂阵线中众多杰出人物中的头领。如果说我当时对他还有不满足地方的话，是嫌他“太老实”，太书生气。他对聂元梓们挑起武斗，没有思想和物质准备，从而使“井冈山”一度陷入被动。这样的老实人，怎么能是反革命？打死我也不相信！

“文革”之后，人们曾对过往进行了反思。一篇文章中曾讲述了这么一种现象：广东人讲求活吃猴脑，饭店老板便饲养了一批猴子以供食用。抓猴子时无须来人动手，只要来人用手一指，群猴便一拥而上，主动地将指定的猴子押解上来，以供食客们活食享用。群猴们何以如此主动，无非是借牺牲同类，以向人类献媚求宠。它们不会去推想，等待它们的，亦将是同类的命运！可叹北大“文革”亦上演了这样同类相残的一幕！“文革”各种斗争，使人激发了各种兽性，北大尚且如此，中国则何以堪！？

四面楚歌，我的政治处境愈加恶化。工宣队纠合一些派性很强的“公社”同学，把目标对准了我。主管我们班的工宣队孙师傅，在班上不断施压，扬言要在班里揪出“大老虎”。并且引而不发，动辄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相威胁。我心里明镜似的，他是冲着我而来的。孙师傅不但这么说，而且付诸行动，把铺盖搬到了我的宿舍，睡到了我的对面，以这种方法来对我施压，并时刻监督观察我的表现。我的心理素质与身体素质尚可，且年轻人觉重，即便如此，一挨枕头，仍呼呼入睡，睡得很香甜。我认定，自己不是“反革命”，从事的反聂斗争是完全正义的，因此，心里十分坦然。只是，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曾经告过张春桥的状，此事一旦泄露，则后果不堪设想。幸亏，林杰不曾向有关方告密，我班我系“公社”派同学不知内情，我班以及外班参与其事同学，品行与心理素质甚佳，没有迫于压力而揭密举报。宣传队尽管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却未抓到我的任何把柄，也就无可奈何。我衷心感谢班里班外“井冈山”的“战友们”，他们强烈的“派性”和善良之性保护了我。有山东大葱之称的王振美还因我挨整而当众哭泣，认定我是好人，不该挨整。许多年后，我的妻子去山东出差，特地去拜访了这位大姐，聊起当年往事，王大葱说：“奚学瑶是我们班最单纯的人！”我闻之受宠若惊，“单纯”不敢当，书生气倒是真的！

## 十一．柳暗花明

政治风云，常常是忽东忽西。因此，倘一旦遭受政治重压，一定不要因绝望而不归。一定要坚守，坚守，再坚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文革”政治跌宕，使我深深地懂得了这一道理。

春风送暖，3月24日，毛主席的御林军八三四一部队在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率领下进驻北大。进校之后，他们便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的口号。我们已经预感到，他们是纠偏来了！包括翦伯赞、李人杰等30多人的生命呐喊，终于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便在“六厂一校”之外，增添了一个北大的名额，成为“六厂二校”，并亲自指导其“斗、批、改”工作。

进驻我们系的八三四一领导人是孙连仲，当过毛主席的警卫员，此时任营指导员、八三四一党委委员。虽然原四五八七部队支左人员与北京齿轮厂工人尚在，但八三四一强势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孙连仲便成了中文系运动的主宰者。他们先是深入调查摸底，然后以惯常的所谓“抓典型”方法来推动工作。到我们班来的八三四一战士叫陈忠道，山东人，小个子，在部队里是个五好战士，思想较成熟，待人十分和气，素质明显高于四五八七部队的一般战士。他到我们班后，多次找我谈心，了解学校与中文系的运动以及我们的思想状况。他与人为善的态度，明显有别于原来的工军宣队，因此我也十分配合地把各种情况竹筒倒豆子般地告诉他。之后，系里八三四一领导孙连仲和工军宣队其他几个人都找我谈了话。我先是在班里作了“斗私批修”，批评“井冈山”和个人的派性。之后，让我作为中文系“井冈山”的代表，与“公社”中文系的代表曹广志一起到办公楼礼堂，面对中文系师生和全校各系师生代表，作了“讲用”报告。相比曹广志的张扬，我的诚恳态度，取得了师生们和工军宣队的认同，于是，我便成了中文系以至全校的“斗私批修，消除派性”的先进典型。进而，他们又引导我，三次去被07纵抄过家的崔庚昌家道歉认错，以所谓“三访崔庚昌”的故事在校系内广为宣扬。并且，中文系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让我与崔庚昌各自进行自我批评，然后握手言欢，演出了一场所谓的样板戏，结成了所谓的“一对红”。

全校上下，各系各单位都如上述方法，让两派人物各自进行自我批评，消除派性，消除对立情绪。客观上讲，双方心平气和了一些，“派性”有所淡化。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两和皆友，两斗皆仇”，让比较权威、比较公允的中间人调解这个矛盾，这是不可或缺的。八三四一在北大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这样一个调解者的作用。当然，两派的对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表面上是和解了，但一些人的内心依然结着冰团，“派”的情感不易消融。有些人依然耿耿于怀，等待时机，以图报复。此情后来演绎了新的故事，且待下回分解。

八三四一来来了，不少人走出了牛棚，摘掉了所谓历史反革命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樊立勤和邓朴方也被送进了医院治疗。一天我与其他几个同学去积水潭医院看望樊立勤，樊住在朝南的一间大病房里，还有几个病友，屋内颇有人气。樊立勤的情绪也很好，言之滔滔，底气很足。临行，他瘸着腿送我们到楼道，指着北屋一间病房悄悄告诉我们，邓朴方住在那里。我们隔着门窗往里一瞅，邓朴方正静静地躺在床上。樊、邓二人，同命相怜，由此相识。据樊后来讲，邓朴方曾向他讲述过他之所以跳楼的原因：一是不理解，父母从来不让我们与刘家往来，现在怎么搞在一起，成了刘邓路线？二是毛整人，历来都是往死里整的，父亲挨整他感到了绝望。

樊立勤出院以后，为了显示他的生命力，经常拄着一根向日葵杆，有意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表明不死的樊立勤又回来了！与此相映照的是另一道风景线，当时主持北大实际工作的八三四一副政委王连龙，也经常在校园里逛，下雨天，则打着一把雨伞，深入到各系了解情况。与此前的学校掌权者的高高在上相比，体现了八三四一领导朴实的老八路作风。

樊立勤宁死不屈的表现，成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每到晚上，各系原先互不相识的同学，都纷纷挤到他的宿舍里一睹他的风采，或与他闲聊。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宿舍里，里边极为凌乱，但无碍同学们对他的景仰，每天都是高朋满座。……

八三四一进校数月，纠正了原工军宣队的一些极左政策，安抚了人心，又大搞所谓的“三忠于”（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革命路线）讲用会，借以批判两派的“派性”。从来不认错的聂元梓、孙蓬一等人，也上台“讲用”。聂元梓在“讲用”中承认一系列严重问题：“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派人搞枪支，为武斗升级做准备。为摧垮‘井冈山’，大抓反动小集团，扣押工资，助学金，甚至断电、断粮、往28楼里灌水……还随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聂还承认掌权后，“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实用主义



的态度。合我意的就执行，不合我意的就不执行，甚至歪曲，断章取义……”。

经过这番工作，北大的“文革”和工军宣传队前期工作终于水落石出，有了明确的结论。宣传队领导小组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上报了题为《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的工作总结。该总结认定，工军宣传队前期在北大犯有错误，“一碗水没有端平”，“没有解决聂元梓一派掌权的错误”，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继续了校文革打对立派反革命小集团的错误，清队扩大化。”这份文件还说校文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它后期变成了“一派掌权”的“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把大批师生员工“打成反革命”……

这份重要文件，似对北大文革与工军宣传队前期的工作做了一个权威性的结论，体现了正义，顺乎了人心，使我们的奋斗，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理想结果，当然，也是聂元梓及共拥趸们所没有料想到的。……

水到渠成，两派终于从名义上实现了大联合。

六月三十日，军宣队告诉我，让我代表全校红卫兵在大联合会上发言，由我自拟发言稿。七月一日下午，我被告知到哲学楼去通稿。走进军宣队办公室，聂元梓已经在室内。她打听我的姓名和身份，表示不知道我。言外之意，你怎么会代表“井冈山”发言？在“井冈山”内，我不是大名鼎鼎的头面人物，不知道也不足为奇。只是，年轻人争强好胜，有意调侃了她一下：“你不能知己知彼，所以不能百战百胜！”聂元梓无奈地瞅了我一眼，无言以对。

当晚，学校两派大联合大会在东操场召开。聂元梓临时去市革委会开会，由孙蓬一顶替她，作为“校文革”和“公社”派的代表，坐在主席台上。孙蓬一此时没有丝毫的暴戾之气，显得和善热情。他主动地向我介绍了作为全校教师代表的张龙翔，说他是生物化学家。张龙翔当时的名气不是很大，后来则继周培源之后，出任了北大校长。我们都作为不同方面的代表发了言，工军宣队的代表则依稀是八三四一政委的杨德中，他是当时北大的最高人物。

我名义上是代表全校红卫兵，实际上是代表“井冈山”这一派。能作为“井冈山”这一派的代表，我心里颇为高兴，深感荣幸。按理，“井冈山”的代表人物应是侯汉清、牛辉林等人，诸多错杂原因，使我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唯一贴近这一称号的是，我对活动的全身心投入和坚定的“派性”，在“井冈山”数度危难时刻，我没有动摇，没有出卖过朋友。我是一个志在文学艺术的书生，对从政向来不感兴趣，造化弄人，居然让我登上了北大的政治舞台。我当时心中隐隐地预感到，这应是我政治路途的最高点，我以后不会继续此途的。

既然被“典型”，被“代表”，便少不了被当做工具使用，一些场合便要作为代表去发言表态。如学校里召开什么读红书读好书大会，便让我上台带头倡议。中文系召开批判“历史反革命分子”川岛会议，别人拟定发言稿，让我上台发言。孙连仲面授机宜，让我在发言当中责问川岛历史上有否干过某件事情。我照办了，谁知耿直的川岛先生，毫不气馁，在台下响亮地回答：“我没干过！”我一时无言以对，只得高喊“打倒川岛”、“川岛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等口号，以压住他所谓的“气焰”。

……

慢慢地，我对这些活动产生了厌倦之情，并且产生了思家之念，也将这种情绪写信告诉家里。不久，即接到妹妹发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真接到这样的电报，心里倒反而忐忑，担心真有什么不测！赶紧向系里宣传队领导请了假，赶回上海家中，见到母亲安好，才安下心来。在上海，我看望了舅舅、中学同学、同学父母，还有我的中学历史老师林丙义。林老师于

“文革”初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驳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而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他当时所有活动都在监视之中。我去看他，虹口中学当局即派了一个老师在旁边做记录。我经历了北大的运动，感受了八三四一在北大落实政策的过程，似得风气之先，颇为自信。我滔滔不绝地讲了八三四一在北大的有关政策，意在让林老师放心，他是不要紧的。当晚，林老师找到了我家，请我到外边饭馆吃了一顿饭。我想，我的一番话，对处于困难之中的他，总有几分安慰。只是，据说毛主席曾看过他的文章，对此文有“很毒”的评语。因此，他与贺绿汀、周谷城等知识分子，成为上海最晚被平反的几个“文革”受难者之一。许多年后，我返沪参加虹口中学校庆，见到林老师当年的女友，她在流泪哭泣。那天，我也见到了林老师，他已成了华东师大的教授，身体健康，神态颇为阳光。政治错讹而使他们未成眷属，编织了人间的一场悲剧。如此悲剧，中国“文革”之中，岂止千万！

## 十二．北大黄昏

林彪“一〇一八”（即10月18日）命令一下，北大即马上兵分三路：大部分老师去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农场；技物系、无线电系、数力系力学专业等少数师生去陕西汉中653分校；而大部分系的学生和少数老师则以教改为名，分散到北京郊区各县劳动。中文系则去平谷县鱼子山村，据说该村是当年八路军活动的根据地。同学们和宣传队员以所谓部队“拉练”的方式，步行到了鱼子山。我则因腿疾而受照顾，坐车抵达。

（略）

临近元旦，突然接到学校里的指令，从中文系抽调部分师生回校参加大批判。王瑶、段宝林、孙庆升老师，还有郭建模、董学文、王坚、张希钦以及留在学校机关帮忙的龙协涛等同学，我也列于其中。到学校集中后，发现有文、史、哲、图书馆学系等数十人，杨克明、侯汉清也在其中。并且听说清华也组织了这么一个班子。这个班子搞得十分神秘，目的是批判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所谓“四条汉子”，但又没有明确批判他们什么问题，是哪个时代的问题。还在哲学楼西侧的阶梯教室开了一个誓师会，我代表中文系小组发了言。然后，由军宣队负责宣传的同志讲解所谓的批判文章的写作方法。新华社、《光明日报》记者闻讯闯进了我们房间，一边来摸底一边来组稿。只是，根据上边的纪律，我们什么都不能对外透露。其实，突如其来的批判活动，其来龙去脉，我们也并不清楚。后来，才得知是所谓江青的指示，是江青对所谓“四条汉子”的历史清算。

学校让图书馆对我们大开绿灯，凡是有关的图书、杂志、报纸都随我们任意浏览并借阅。在北大，尤其在“文革”之后，这些东西对我们一直是封锁隔离的，今天突然对我们解禁，就像一头空腹的牛，一旦闯入青草地，便贪婪地大嚼起来。我们狼吞虎咽地阅读了许多三十年代旧杂志，读了一些所谓“四条汉子”的旧著作。其中，对阳翰笙、田汉的剧作印象尤其深刻。王瑶先生谙熟现代文学史，他作为我们的顾问，给我们介绍了鲁迅、胡风、徐懋庸和所谓“四条汉子”的斗争，还介绍了他亲历的解放后周扬搞“反攻倒算”的一次会议。我的悟性差，瞎子摸象，把批判焦点放在了解放后，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短文，之后，亦与段宝林、郭建模等人合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董学文是《新北大》报社编辑，擅长写批判文章，且干劲十足，用一天时间，即草拟了一篇八千多字的长文，并且“击中要害”，后经他人修改补充，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之后，我们毕业离校，而留校的写作班中一些师生，则成了“梁效”的班底。

我们集中住在30楼，当时全校宿舍区停止供暖，我们也就这么“革命化”，硬挺着。和我们同楼一起“革命化”的还有几个待分配的学生。我所认识的有中文系的陈一谔，8341解救了他，给他落实政策，准备给他照常分配。他的政治热情颇高，多次上访迟群等8341领导人，自行联系去河南新蔡从事农村教育革命活动。另外几个是技术物理系62级的王彦、何

维凌、胡定国。他们因创立所谓的“共产青年学会”而被打成反革命，8341给他们解除了囚禁，他们可以自由活动。他们三人经常旅进旅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眼睛十分明亮的上海姑娘，据说是王彦在上海结识的女友。何维凌也是上海人，毕业于虹口复兴中学，学习成绩拔尖，据说会三国外语。后来，他成了社会活动家，因与邓朴方和赵紫阳的关系，而受到美国有关部门的重视，曾被美国一个小城市授予名誉市民的称号。“六四”前夕，他被安全部拘留，被软禁在密云水库旁的安全部疗养院内，在那里钓鱼教子。一年后解禁从商，第一站便来到秦皇岛，曾带着新夫人并两个孩子来我们家。我以白薯招待之。之后不久，他家电话即发出呜呜的怪异声。我从他人处得知，他与夫人去墨西哥经商，因急速驱驰，遇到目标不及回避而相撞起火，呜呼二命归天！他竟然在万里异乡，结束了自己朝气蓬勃的生命！

春节过后不久，下乡的大部队回到了学校，同学们急切地等待分配离校。同学们在学校里经历了文化革命，经受了許多折腾，普遍地急于离开北大这块是非之地。宣传队则是为了把这批“末代臭老九”打发走，好给工农兵学员腾出地方，故清华、北大二校较之其他学校先行毕业。北大文科64、65级与理科的63、64、65三个年级的学生，统统于1970年3月中旬被扫地出门——除极少数与宣传队关系好的留校之外。陈一谔下乡搞教育革命试验的理想，对我颇有影响。我儿童时代生活在农村，之后长期在城市生活，未参加过“四清”，故对农村抱着桃花源和乌托邦式的幻想。在北大折腾够了，折腾累了，希望到农村去，另辟蹊径。与此同时，我们班的另一同学，则十分老成。他来自农村，毕业再也不愿回农村。他对别人说：“农村太苦了！”因此，他积极靠近宣传队，要求留校，最终他达到了目的。

陈一谔终于去了河南上蔡。在他的如簧之舌的鼓动下，小他十二岁的高干子弟吴琰及吴的同学邓立群之子邓英陶先后前往。后来，陈、吴相恋成婚，并于“文革”后返京，从事农村调查活动，从而走上了政坛。“六四”前他是赵紫阳麾下的经济改革研究所所长，“六四”后逃亡至美国，成为哈佛大学的研究员。

我给王连龙副政委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要去农村的志愿，记得我引用了毛主席的两段语录，其中一段是来自他的“七三批示”：“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又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了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这些语录带着神圣的光环，我们虔诚地信奉它们，并为它们所感召。终于，我如愿以偿地分配到河北抚宁县插队落户，一竿子插到底，当起了农民。

比起上几届“井冈山”人来，我们幸运多了！我们的档案里没有塞进所谓“反对红色政权‘校文革’”的黑材料。我们终于能够以清白之身离开北大了！

于是，人生开始了新阶段！

再见了，燕园的湖光塔影！再见了，学生时代的玉宇琼楼！再见了，我们曾为之祭献热血和生命的青春的土地！

### 十三.“文革”余波

在北大，我是“红卫兵代表”，出了校门，我便成了“臭老九”，角色被迅速转换。然而，自己并没有随角色转换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我，包括我们一起在河北抚宁县插队的十余个北大、清华、南开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依然书生气十足，不懂得也不屑和当地的一些干部打成一片。在他们的眼睛里，我们是“臭老九”，但又没有上过几年大学，是不同于众的另类。尤

其是我，因坚持在“插队”之后再分配中，要求专业对口，而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刺儿头，不被重用，也不让调离当地。青春岁月有如只能冒烟的湿木头，在那里毫无色彩毫无光热地虚度。尽管如此，几年北大生涯，使我多少明白一些“理想坚守和文化自觉”。我相信这种生活不会持久，应该积攒知识，养精蓄锐，以待来日。我利用在农村工作队和县创作组闲暇之时，尽力阅读文、史、哲和政治书籍，学习俄语。这种行为，有别于当地的习俗和当时的风气，自然招来多种猜测和议论，虽然支持鼓励者有之，但更多的则是冷嘲与热讽。对此，我不予理会，依然我行我素。大约在1973年，我接到了杨克明老师的一封信，谓北大哲学系要招研究生，鼓励我报考，并为我指定了一些书目。我很倾心周一良的世界史，在侯汉清的介绍下，给周一良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周先生回复了很客观的一封信，大意是搞世界史必须有很好的外语基础，你有中文基础，还是继续攻读中国文学为好。后来，北大招收研究生一事，如石沉大海，杳无声息，此事便成了一个虚幻的泡影。

沉入社会底层，深感底层文化的世俗枯寂，先期在抚宁县如此，后来调到秦皇岛亦无多大改善，因此我与同学们都期望获得机会，得以摆脱这种心灵上的困穷。当时情况下，要调到大城市去对口专业，要比登天还难。毕竟年轻，来日方长，我们对前景仍抱有期待。

机会终于来临了！“四人帮”垮台，百废皆兴，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报考，均被提上了日程。一九七八年初，便传来了“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报考的消息。我很兴奋，且满怀信心。这些年来，虽处逆境，而精神上依然奋发向上，一直没有放弃学习，无论是外语，还是文、史、哲。我自信，在这一代知识青年面前，我的思想学识是处于前列的。

在众多的报考地域面前，北京是我唯一的选择。北京曾是我求学的地方，那里有我许多同学朋友、老师亲戚，而且北京是中国政治思想、学术文化最活跃最敏感的地方。至于报考专业，一度我曾考虑过现代文学、佛学，但最终还是落定在新闻学上。我以为，新的时代到来了，一个可以讲真话的时代来临了，新闻可以大有作为。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新闻业务专业，但当时并不知道它是替《人民日报》代培的。报考专业确定后，蒙我的顶头上司——秦皇岛郊区文化馆馆长老刘的关照，我得以隔天上班，隔天在家复习。临考前夜，十分兴奋，异于往常，迟迟不能入睡。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即骑车赴考，不经意之中，居然将本该挂在车把上的书包，失落在地下。一道阴影，轻轻地在心头划过——当年高考临考前，在考场外，曾意外地逮住一只麻雀，又将之放生，它给我带来了好运。今天，书包失落，难道是一种不祥之兆么？

考试之中，渐入佳境，除了第一堂的政治卷看错了题，由于紧张，将简要回答误为详细阐述，洋洋洒洒，不着边际。其余课目，如地理、外语、新闻理论，均正常发挥，且流畅自然，不时有得意之笔，外语还完成了20分的加分题。写作是我的长项，在两个小时中，我圆满地编写了一个与“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代理人斗争的故事，写得热血沸腾，激情洋溢，走出考场，自我感觉甚好。

一个多月后，成绩下来了。除了政治刚及格之外，地理、外语、新闻理论均获得了满意的成绩，作文85分，合乎自己的预想。我被通知赴京参加复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考试的复试场地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在这里，我见到了报考“社科院”的白寔岐、张国祯、陈开国等北大许多老同学，他们都为此次机遇作了长期的准备。此次报考新闻业务专业的考生为800多人，录取名额为30多人。在复试期间，我得知我的初试成绩位于前列，是内部名单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打钩者。我在复试之中亦得到了正常的发挥。

考试颇顺利，心情很好。

.....

北大的许多老同学，也奋发努力，试图通过此次机遇，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或在“社科院”，或在“中科院”，或在北大，参与了多个专业的复试。借此机会，我们又在北大重逢了。我的情况，很快便在中文系传开。当时的中文系总支书记吕梁，他来自人大新闻系，“文革”后调来北大，并不了解我。他让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询问有关崔庚昌的问题。显然，崔庚昌告了我的状。而且他作为中文系的会计，成天在吕梁的左右，是他的心腹之人，吕梁偏听偏信了他的话，话语中明显带有倾向性。我介绍了有关情况，对吕梁的一些话作了申辩。吕梁试图以权势压我，我即以北大当时的大形势相反驳。两人不欢而散。

回到秦皇岛之后，我颇自信，颇乐观，故放弃了北大回炉班的考试，而坐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通知书的到来。

谁知，我得到的却是不录取的通知！

长期的准备，出色的发挥，等到的却是如此结果！眼前顿时一片茫然，待清醒过来思想，不对，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于是，我动身赴京，住到了北大。我先以他人名义给负责招生工作的《人民日报》干部、新闻所副所长XX，打了电话，谓奚学瑶要来京寻访。电话中，XX似乎有些惊慌，连连说道：“不要来了，不要来了！”我又通过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孟繁华，了解内情。他告知我的考试成绩不错，而政审没有通过，原因是所谓“文革”期间表现不好。我心里有了底，便来到了王府井《人民日报》社。通过电话联系，报社政治部派来了一个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來接待我。我做了自我介绍，特别是介绍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来人很认真地听取了我的介绍，诚恳地建议我写材料向上申诉。回到北大，我给负责政审的《人民日报》政治部写了申诉材料。之后，我又到北大办公楼试图找北大党委书记周林当面反映情况。他的秘书朱某某接待了我，听取了我的反映，他表示要将情况反映给周林，并建议我再到“运动办”反映情况。

所谓“运动办”，就是落实“文革”和其它运动中有关政策的机构。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是潘乃燧——潘光旦的长女。她与她的丈夫、妹妹、妹夫等均是“文革”冲击对象，因而对我的遭遇深表不满和同情。她在听取了我的反映以后，向周林做了汇报，并根据周林的指示，带着“运动办”的一名干部（生物系教员），来到王府井，见到了《人民日报》政治部的副主任郝汉鼎，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和北大党委的意见，并介绍了我在“文革”中的表现。郝汉鼎首先问道：“你们是哪一派的？”当说到北大党委的意见时，他问道：“是个人意见呢还是党委开会讨论通过的？”……看来，郝汉鼎带着明显的倾向性，态度很不正常。潘乃燧回来向周林作了汇报，也向我谈了感觉：“他们里边准有新北大大公社的人！”

我自己不但写了申诉信，还直接来到《人民日报》政治部，见到了郝汉鼎。郝近六十岁年纪，山西口音，言谈举止不像一个文化人，很可能是出身吕梁或太行山的老干部。我对他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反聂元梓，而聂元梓已被逮捕，被中央定了性。”我还说：“运动中我没搞过打砸抢。”

使我惊讶的是，他居然回答道：“聂元梓也没搞过打砸抢，你们怎么把责任都算到她的头上了？！”

我惊讶得无言以对，陷入了沉思。看来，他们与聂元梓可不是一般的关系！百足之虫，死

而不僵，倒台的聂元梓仍有她身后的社会背景作支撑，他们对聂元梓倒台抱有强烈的不满，对我这个反聂元梓的骨干自然耿耿于怀。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公平正义，与他们分辩无异是对牛弹琴！

回到了北大，与运动办进行了沟通。他们建议我让中文系党总支对我的文革表现做一个正式的文字结论，然后向《人民日报》递交。我找了原中文系党总支的负责人华秀珠、费振刚等人，他们经历了北大“文革”，对我了解，他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肯定了我“文革”中的表现，而到了吕梁那里，他则耍了一个滑头。结论中空空洞洞地肯定了我反聂的大方向，却比较详细地书写了我曾带人抄崔庚昌家的事，试图以枝叶来否定整棵树木。这样的结论我当然不干，它则清楚地反映了吕梁个人的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在这里，除了表明他与崔庚昌有着密切的个人关系之外，与聂元梓有无更深层的政治历史背景，则不得而知。他较之《人民日报》的郝汉鼎更有文化更有城府，自然不像郝汉鼎那样赤裸裸地为聂元梓打抱不平。显然，北大中文系以吕梁为首的一股势力与《人民日报》政治部的某些人是串通在一起的，他们共同在背后谋害一个无权无势无背景的一介书生！

害人者仍想继续加害于我。一次，在读研究生冯隆同学撞见崔庚昌正与一王姓老师密谋。他愤怒地指着他们说：“你们害了他一次还嫌不够，还想害他一辈子吗？”我也感谢赵园，她此时已在王瑶先生门下研读现代文学，闻讯来到我的住所，问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她能做些什么呢？有这么一句话就够了！中文系的许多老师对我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与不平，与我们班一起学习、生活过的冯钟芸先生很有意见，她说：“奚学瑶我知道，他很聪明，很单纯！”吕梁的前任、曾担任过中文系总支书记的曹先擢先生当面对我说：“你反聂有功！反聂有功的人怎么变有罪的了？！”徐通锵先生则深为同情，他甚至设想找人把我录取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去。时为北大校长的周培源先生也曾向我许诺，将来要把我弄回北大。只是后来他自身也焦头烂额，未能兑现承诺……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在听取了我的申诉后，明确表态，认定他们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因为新闻业务专业是“社科院”新闻所为《人民日报》代培，政审权在《人民日报》政治部，他无权决定此事。他三次通过电话与该报政治部交涉。回答是：“你们‘社科院’哪个所录取我们都不管，反正我们不录取他！”

此事在北大、“社科院”和“中科院”研究生院传开了。尤其是原北大“井冈山”新入学的研究生们对此颠倒黑白的事情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此事不仅关系到我个人命运，也事关北大“文革”的大是大非。“社科院”考古所的新科研究生靳枫毅、马洪路带头，“社科院”、“中科院”、北大70余研究生、北大老同学签了名，由樊立勤以及出差来京的张国祯抄写了一式二份名为《致邓小平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一份贴到了王府井《人民日报》社门口，一份贴到了西单民主墙上。此事，在当时的北京形成了一个事件，观看大字报者水泄不通，也有外国人拍了照片，有人称之为“小公车上书”。《人民日报》的某些人，看到大字报之后，气急败坏，既顽固坚持原先的立场，又反过来倒打一耙：“奚学瑶要是不贴大字报，我们就录取他了！”又说：“幸亏我们没有录取他，他是震派人物！”

此事，终于无果而终。《人民日报》政治部某些人，倚仗着自己的权势，践踏了人权，剥夺了我本该继续深造的正当权利。这是我个人的损失，也是《人民日报》的损失；我失去了再学习的机会，失去了报效国家、为民鼓与呼的一个平台；而《人民日报》则失去了一个正直而有才华的编辑和记者！这是《人民日报》永远难以抹杀的耻辱！

《人民日报》狼狈地处于被一群青年知识分子控告的地位。这大概是“文革”后第一次民告官了，告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国第一党报。北大中文系某些人的背后动作也终于被暴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由于他们心虚理亏，他们对我们的控告，不敢做出任何公开反应，也未敢进一步加害于我。就我个人而言，身处社会底层，学习与工作会相对艰难。但是，我经历过“文革”和“文革”后的各种磨练，不会就此屈服消沉。中国少了一个记者、编辑，却多了一个作家、学者！如今我的心态平和，身体健康，当年境遇，成了我的人生财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求仁得仁，对于个人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回首往事，正可谓：“指顾崎岖成坦道，笑谈荆棘等浮云！”此外，我也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的邪恶之株根深蒂固，与之斗争，须坚韧不拔，且要为之付出各种代价，愈走在前边者，愈要有自我牺牲的思想准备，与刘玮、樊立勤们相比，我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

历史因此而丰富多彩！

人生因此而值得回味！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